

现代性、流动性与跨文化沟通

张弛

摘要：尽管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各国人民之间的跨文化沟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甚至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随着现代性自西欧展开并向全球推进，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就不断地相互冲突：一种是全球主义、普世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等，与之相反的是民族主义、特殊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等。极端的左右思想冲突造成了跨文化交流问题的复杂化。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共存、彼此的承诺，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人类社会——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关键词：跨文化沟通 现代性 流动性

引言

早在被史书记载之前，居住在不同地区人民之间就进行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交流。在许多地方考古发现的丰富实物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20世纪初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旅行条件非常不利，通信手段非常低级，却未能阻止人们去探索非常遥远的国度。旅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未能返回家乡的传教者、朝圣者、商人、信使、外交官、探险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跨文化交流？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人总是需要他人来构建社会生活，而每个社会只有相对的自主性。

很难想象在完全闭关锁国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民不会遭受物质、

经济、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匮乏。即使在过去，那些强大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希腊、罗马等，其君主和居民从未感到可以自给自足。他们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天然物产和工艺产品来便利他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异域文化产品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其他民族的思想成果来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深化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一个小小的船队，开始了前往印度的海上旅程。他当时显然不知道自己开启了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哥伦布之后，没有一个族群可以完全脱离外部世界而存在。不管其意愿如何，地球上的所有族群都被卷入全球历史进程之中，并在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流动或迁移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显著且正常的现象。由于政治，经济，教育和技术的进步，跨文化交流在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都变得非常容易。

悖论的问题是，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稳定性，正如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他的一幅巨作上所写的题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来自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但相互对话和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又有多少？最重要的是，在大规模移民的当代，许多移民及其后裔并没有意愿融入东道国的社会生活，自愿保留着他们的“异乡人”身份。在日益面临文化差异的环境中，许多人并没有选择积极的对话和积极的了解，殊不知这些对话和理解可以让它们拓宽视野，丰富思想。

全球化在快速发展，行政、边界、技术等多方面的阻碍已被消除。不幸的是，文化却成为人与人之间一道巨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性、流动性和跨文化沟通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当前问题的根源并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

全球化、全球市场与和全面沟通

从上古到中世纪，长途旅行充满着艰辛和危险，同时也具有冒险

意味和英雄主义。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伟大的冒险家，如张骞（公元前164—前114年）、法显（334—420）和玄奘（602—664）等，他们应该听说过“丝绸之路”和《马可波罗游记》。我们都知道这本神奇的书引起了很多欧洲人对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的极大兴趣。当时，丝绸之路已被中亚的穆斯林阻断，欧洲人只能通过海洋，寻找通往东亚的可能航线。

现代（或称“现代时期”）始于1453年的标志性事件：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宣告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灭亡。然而，更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于1492年：由西班牙王室资助的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在驶向印度的航行中，意外地发现了美洲，从而结束了这块大陆使长期与世隔绝的局面。哥伦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引出了地理大发现。1498年，达·伽马（1469—1524）的船队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成为通过海路首次抵达印度的欧洲人。1522年9月，斐迪南·麦哲伦（1480—1521）的船队发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显示出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了从美洲输入的黄金白银对欧洲经济造成的后果。到了19世纪中期，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才被人们看得更为清楚。它首先刺激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中世纪封建秩序的解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革命因素得以在崩溃中的封建社会内部迅速发展。”^① 西欧与世界各地的直接贸易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世界市场反过来刺激了西欧从小作坊到大工业的发展。西欧大工业生产降低了成本，使其他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受到严重的冲击，也打破了许多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局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273页。

面，被迫参与全球经济的分工。“新的工业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①初期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维持，常常依靠的是西欧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西欧是世界市场的积极推动者，而亚洲、非洲和美洲则是被动且被迫地进入到这一市场体系之中，尽管也会从中获得好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②

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所有人都需要相互依存。在此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全球化也为帝国主义赋予了一种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打着“文明”、“宗教”、“革命”等旗号，强国实施这些行为：探察、干涉、入侵、占领、兼并和殖民。

现代与现代性的悖论

伴随哥伦布的大航海，中世纪悄然落幕，现代的帷幕瞬间开启。

有意思的是，法语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是复数。对于很多法国历史学家来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结了现代，开启了直至今日的当代，而当代涵盖了绝对君主制的终结、工业革命、世界大战和通信手段的发展。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现代还没有结束，而当代只是最近的现代，即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发生在此期间的重要事件，有冷战（1945—1991）、民主化浪潮、宗教冲突、移民大潮、信息时代、世界金融危机等。我们同意法国以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 同上。

外的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现代意味着现代理念取得胜利的时代。这些理念是进步、交流和理性。

与“现代”关联的一个重要术语是“现代性”，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与传统的决裂。^①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现代性既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是特色鲜明的一种文明模式，反对传统的模式，即反对所有其他先前的文化或传统的文化：面对上述文化在地理和象征方面的多样性，现代性自我设定为单一的、同质的，从西方向全球辐射。”^②对许多人来说，“现代世界被认为是一个个体主义的王国，表象和主体性的王国，探索与发现的王国，自由、权利、平等、宽容、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王国。”^③

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被全世界的人们正在经验着的一种悖论：

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我将把这种经验称作“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

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

① “Modernité”, in Éric Gobast, *Petites leçons de culture générale* (6^e édition, Paris: PUF, coll. “Major”, 2007), p. 159.

② Henri Lefèvre, “Modernité”, in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version 8 en DVD (Paris: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France S. A., 2002).

③ [美]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2页。

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

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旋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

为什么现代性会是一个悖论呢？因为现代性本身就具有自我消解的特质，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兹所说：“现代性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毁灭。”^② 法国象征派诗人阿尔蒂尔·兰波的这句诗众所周知：“必须要绝对地现代。”这就是现代性的逻辑：变化或者是持续的流动性，否定稳定性、固定性和不动性。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使危机成为一种价值，成为一种矛盾的道德”^③。

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

不幸的是，历史时期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划分的。这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世界现代史也并非偶然地始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英法战争之结束。英国金雀花王朝与法国瓦卢瓦王朝之间的这场战争，尽管打打停停，但还是从1337年持续到了1453年。这场战争标志着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结束，以及法国作为民族国家（État-Nation）的诞生。曾经联合发动十字军东征的英国和法国，在结束了双方的领土之争以后，完全有能力驰援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拜占庭帝国。然而，它们却忽视基督教的千年帝国，在伊斯兰教奥斯曼军队的围攻中彻底灭亡。

①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② “Modernité”，in Éric Gobast, *Petites leçons de culture générale*, 6^e édition, Paris: PUF, coll. “Major”, 2007, p. 159.

③ Henri Lefèvre, “Modernité”, in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version 8 en DVD.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创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独立，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地区，虽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民族。^①

“民族”这个词来自拉丁语“natio”，它来源于动词“nascere”（“出生”）。它指生活同一个地域的人们，也意味着“同一起源的人群”。法语单词“nation”与拉丁词“natio”有相同的含义。作为“种族”的同义词，它指的是“人们假定有共同起源的一群人”。作为“人”的同义词，还等同于“人群，一般都人数很多，其特点是有统一的（历史、社会、文化）认识，和共同生活的意愿”。但增加了一个新的意义，就是“主权国家”，这意味着“基于既定的一块领土或多块领土，打造出来体现主权的政治共同体”^②。

在法国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中，当主人公唱出他对“亲爱的法国”（la douce France）的热爱时，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祖国河山的自然而然的一种挚爱之情。然而，百年战争在法国人当中激发出了法国民族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强化爱国主义感情的同时，将其现代化并改造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民族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的演变伴随着所有人群的民族意识相继觉醒，引发了古老王国或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或未独立民族创建主权国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Nation”, in *Le Nouveau Petit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2007*.

家的要求。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被提出来并被接受。它一开始针对的是王权，即国家主权掌握在君主手中（法国后来称之为“旧制度”）：民族主义倾向于使主权属于人民的民族国家的创建得以合法化。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欧洲逐渐确立，随后传播到了亚洲和非洲，成为了许多次革命、内战和国际战争的根源。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民族主义也被表现为在一个国家的民众当中传播和激发的一种民族情感。它具有极强的适应性：无论是共产主义、议会民主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能把民族主义整合进去。作为一个强劲有效的动员因素，民族主义常常为20世纪的种族清洗活动提供依据。

爱国主义是个人对他视为祖国的国家的忠诚。在混合了民族主义并被其强化以后，爱国主义常常悖论地引发与其他民族国家在领土、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争端，并激发对他国人民的强烈仇恨。

在《思想录》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邀请我们思考在没有实际联系或者争议的人之间的杀戮之荒谬。

“你为什么杀我？”——“为什么！你不是住在河水的那一边吗？我的朋友，如果你住在这一边，那么我就会是凶手，并且以这种方式杀你也就是不正义的；但既然你是住在那一边，所以我就是个勇士，而这样做也就是正义的。”^①

战争总是有的。现代社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战争：宗教战争、内战、国际战争、热战和冷战等。以上帝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党派的名义等，人们毫不犹豫也无愧疚地杀死同类。

民族主义也表现为政治运动。它颂扬一个国家的一切形式（政

① [法]布萊茲·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2—163页。

府、文化、宗教、种族、语言、历史、传统、就业偏向等), 并排斥其他国家和其他群体。沙文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一种过度表现。

这是对自己国家过分夸张或过分排他性爱慕情感的反映。在法国, 这种民族主义运动是在1870年左右开始, 在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其拥护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昂扬的国家中, 仇外心理导致种族主义暴力和屠杀, 例如在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和中国人), 在义和团时期的中国(针对西方人), 19世纪后期的美国(针对中国劳工)。

从这些事实中, 我们看到了承诺开放、理解和宽容的全球化的对立面: 只会导致封闭、无知和不宽容的沙文主义以及地方主义和仇外心理。根据《麦克米兰英语词典》(2006), “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 的含义之一是“不愿意接受新观点或异见者的态度”。

“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个人和“没有牵挂的人”

流动性既是现代性的原因, 也是其结果。我们应该记得,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与现代性相关的绝对流动:

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 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僵化的传统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事物都被褻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①

由于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显著、持续的进步，我们的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中，即便身在远方的人也已经成为我们的邻居。虽然国家之间的边界仍然存在，但旅行变得更加容易。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用“流动的当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个说法来描述当代。他是从社会的液化（liquéfaction）与去结构化（déstructuration）这个意义上，把社会描述为“流动的”。这个隐喻表征了人类关系与社会联系的不稳定性：

人类联系确实是脆弱的，而且，在持续变化的情境里，我们不能指望它们保持完整无损。当人们担心长期介入可能会限制其未来的选择自由时，做长期规划就是困难的操练，也显得很冒险。^②

在这种流动模式下，社会结构保持不变的时间不会长到可以自我固化，也不再作为人类行为的参照来运作。这种新的当代性的特点是生活碎片化，要求个体有灵活性，有可能改变地点、工作和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鲍曼的思想强调了我们社会令人不安和紧张的所有方面，比如，使人心安的参照系的丧失、产业的与恐惧文化的全球化。^③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② Zygmunt Bauman, “Rencontre avec Zygmunt Bauman: Vivre dans la modernité liquide”, propos recueillis par Xavier de la Vega, in *Science humaines*, hors-série (“À quoi pensent les philosophes?”), mai-juin 2011, n° 13.

③ “La modernité liquide et ‘les barbares’”, URL: <http://www.immaginoteca.com/2-1-la-modernite-liquide-et-les-barbares/>.

这就是说，个人身份和作为其基础的归属关系从来不是像铁板钉钉那样。“在我们的流动现代性中，世界被分割成互不相似的切片，我们的个人生活碎片化为不连贯的时刻之延续。正如我们所使的那样，我们连续地穿越着‘一些观念和原则的共同体’，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稳定的还是短暂的。”^①其结果是，从时间中的持续性（一致性）与连贯性（自我性）的角度，我们难以体会到主体认同。换句话说，就是感觉到自我恰恰在自己的存在中受到阻碍。因为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处在应该的位置上，不可能知道自己归根结底还是自己，这令人手足无措，倦怠疲惫，心理痛苦。在熟人社会里，生活的意义就像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随着熟人社会的终结，身份认同失去了自然而然的那些表象。

然而，身份认同也因为民族国家遭到质疑而失去了整体保障。即使许多国家仍然实行出生地原则，人们却不再普遍相信出生在哪个国家，实际上就是那个国家人。现代国家就是在意义尚不明确之时确立的。在遭到质疑的情况下，对衔接于多种参照框架的个人存在，它不再能够诉求一种决定性和排他性的支配权力。更重要的是，国家本身已经部分地脱离了我们的生活，显然无法指望它对超出其干预范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作出有效回应了。如果这种新境况部分地解释了各种原教旨主义的成功，它至少还特别是“没有牵挂的人”（l'homme sans attaches）^②这一流动社会的特有中心形象的根源。“没有牵挂的人”是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所描绘的“没有个性的人”（l'homme sans qualités）的后继者。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特别是在近些年来，主体间关系受到了液态化的动力之侵染。在液化化里，较之于持久性，人们更偏爱新颖性和灵活性。而这种状况与特定的技术环境有关，因为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许多运用，进一步肯定了这样一种趋势：原则上构成了与他人的

① Zygmunt Bauman, *Identité*, trad. de l'anglais par Myriam Dennehy (Paris: éd. L'Herne, 2010), p. 22.

② *Ibid.*, p. 87.

所有真正相遇的考验，都不复存在了。在一个超级链接的世界里，我们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超级链接的，然而，我们总是有可能让自己从某些道德契约中解脱出来。

通过对这些趋势的描述，鲍曼邀请我们从批评的角度来审视这样一个世界的演化：我们的状况、决定和责任始终都可能丧失价值。现代性方案的核心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念：以最大限度来建立一个人类共同世界，并设计出意义显著的发展前景。时至今日，这个理念还保留着其合法性：现代性的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开发，现代性的承诺依然被持守。

共在、主体间性和相互担当

我们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完全和绝对的独立状态，因为我们的存在（existence）实际上是一种共在（coexistence）。我们有可能这样说：其他人是我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且，只有在这种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之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自我实现才有可能。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曾经听到一句无法忘怀的话：“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的自由就不完全。”我始终不知道这是谁说的，然而，这不影响它对我的强烈触动。后来，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巴枯宁（1814—1876）的《上帝与国家》一书中，我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只有当我周围的所有人——男人和女人——同样自由之时，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人的自由远远不是对我的自由的一种限制或否定，反而是我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和确认。只有通过别人的自由，我才能真正变得自由，以至于我周围的自由人越多，他们的自由越深越广，就成为我的自由也会变得越深越广。

相反，人们所受的奴役，对我的自由设置了一个障碍。这是

同一回事：他们的动物性是对我的人性的一种否定，因为我再一次无法说自己是真正自由的，除非当我的自由，换句话说，我的人格尊严，我的人类权利，因所有人的赞同而得以确认。我的自由在于不屈服于其他任何人，只根据我自己的信念确定我的行动，而我的行动要考虑到所有人同样自由的良心。被所有人的自由如此确认，我的个人自由延伸至无限。^①

人不可能与他人没有联系而存在，因为他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与他人的共存。让·保罗·萨特（1905—1980）很好地证明了主体性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因为“那个直接从我思中找到自己的人，也发现所有别的人，并且发现他们是自己存在的条件”^②。

他认识到除非别人承认他如此（诸如说一个人高尚，或者说一个人欺诈或者妒忌），他是不可能成为什么的。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入，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情实况的。对于我的存在，别人是少不了的，对于我所能获得的关于自己的任何知识，别人也是同样少不了的。在这些情况下，关于我身己的亲切发现同时也揭示了别人的存在；而面对着我的自由是他的自由；他有思想，有意志，而他这样做时，是不可能不牵涉到我的，必然是或者为我，或者反对我。^③

尽管人际关系问题让我们想到地狱，正如萨特通过《禁闭》（*Huis clos*）中的角色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担当或介入仍然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然而我们也别无选择。“存在主义的

① Michel Bakounine, *Dieu et l'État*, in Michel Bakounine, *Œuvres*, réunies par Max Nettlau puis James Guillaume (Paris: Stock, 1895, t. 1), p. 281.

②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③ 同上。

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终模式的相对性影响。”^①所以，根据萨特的说法，我的自由“完全取决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取决于我的自由”。在我和其他人之间，通过彼此强加的相互担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主体间性。

存在使人类以其产生的人的形象出现：在选择我的生活之时，我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并由此而对所有人负责。这意味着所有的行动和所有的价值选择都应该慎重考虑。实际上，如果做选择的时候，我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必须自问：我是否愿意如此的选择是所有人愿意看到的。因此，萨特的思想就与康德的绝对律令合拍了：“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②

爱德蒙·胡塞尔（1859—1938）指出了意识的对象化，即意识实际上总是对某个事物的意识。^③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主体间性和我们与他人的相互担当，携手共进，才能走出现代性的危机。

结论：打造一个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

诚然，现代性引发了许多矛盾：建设与毁灭、承诺与威胁、希望与绝望、普遍性与个别性、独特性与多样性、流动性与静止性、热情与冷漠、对话与对抗、合作与冲突，统一与分裂，开放与封闭等。“现代性不是处于危机，它就是一场危机：人类的青春期危机。如果人类必须经历其青春期危机，也最好有一天走出这场危机，好歹变为成年

①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第23页。

②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③ Edmond Husserl, *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 Introduction à la phénoménologie*, trad. de l'allemand par Gabrielle Peiffer et Emmanuel Levinas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66), p. 28.

人。问题就在于何时走出危机？只有天晓得。”^①

让我们回想一下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中，波德莱尔(1821—1867)对为“现代性”所下的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②很多人完全忽视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而它恰恰表达了波德莱尔的伟大智慧：在过渡的、短暂的、偶然的那些表面现象之下，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质，而它就是前者们的存在理由。

是的，尽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前所未有地得以加强，他们的文化差异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分歧是相对的，而汇通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属于相同且唯一“人类共同体”。

南宋伟大的儒教哲学家陆九渊(1139—1193)如此表达了他对人心相通的信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年谱》)中国现代大学者钱锺书(1910—1998)自述其从事比较诗学，基于这样的理念：“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③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仍有可能进行跨文化交流。

是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能改变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人类，都是同一大家庭成员的事实。在《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被描述为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说法被认为神话。但是，对基因的科学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全人类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主权国家仍然会存在很长时间，人们也仍将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和文化共同体之中。但是，这些都不是让人们互相敌视、忽视的理由。因此，沿着“欧洲共同体”的思路，我们提倡“人类共同体”的观念。

“人类共同体是什么？”

① Frédéric Guillaud, “La modernité”, in *Conflits actuels* (revue d'étude politique, Paris, n° 12, décembre 2003), p. 6.

② [法]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85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序》第1页。

它是人性的产物！”^①

当司马牛因自己没有兄弟而难过时，孔子开导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当樊迟请孔子解释“仁”的意思时，他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他也向子贡解释了“仁者”的具体表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一位老人的快乐之一就是能够看到他的四代人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古老的以色列人有类似的愿望：“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旧约·诗篇》第133篇，和合本）

圣保罗在一世纪传福音给希腊人和罗马人，从而劝勉圣灵释放基督徒：“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5：13—14，和合本）

根据《旧约·创世记》的记载，上帝这样问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冷淡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4:9，和合本）是的，我们是我们的“人类社区”兄弟姐妹的监护人，尽管我们彼此不认识。

在《丧钟为谁而鸣》一诗里，英国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写道：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① Roger Nifle, “Qu’est-ce qu’une communauté humaine ?”, URL: <http://journal.coherences.com/article/126.html>.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都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王秀珍译)

附记：就在我们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蔓延到全中国，并扩展到多个国家，变成了一场国际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处境里，人性的恶与善都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必要的防范可以阻止瘟疫蔓延，但是，以邻为壑，阻断交通，地域歧视，人种歧视，这些非理性的极端反应，也再一次显示了现代性和流动性大背景下跨文化沟通的必要性。